

《牡丹亭》中杜丽娘女性意识研究

梁盼莉

(郑州大学文学院, 河南省郑州市, 450000)

摘要:《牡丹亭》是明代戏曲家汤显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它赞美了“至情”的“生可为人, 死可为人”, 这集中体现于剧中杜丽娘形象的身上。书中以杜丽娘这一女性形象为主, 叙述了其奇妙而独特的爱情故事, 展现了其追求爱情的勇敢和坚定。本文以杜丽娘形象为例, 对其女性意识里的个体性、社会性进行剖析, 然后与其他传统戏剧女性形象相比较, 深刻地说明了杜丽娘女性意识的形成原因及其表现, 并进一步分析了她的形象与女性自我意识所蕴含的文化意蕴, 从多个角度进行阐述, 把握人物形象的文化意蕴内涵, 并叙述其在当代社会的价值, 领悟书中人物丰富的情感和艺术价值。

关键词:《牡丹亭》; 杜丽娘; 人物形象; 文化意蕴; 女性意识

中图分类号: I2 **文献标识码:** A

在当今这个女性意识不断觉醒的年代里, 更多的作家在其作品中表现了女性意识觉醒的印记, 而许多人也对此进行了更多反思, 女性独立的旗帜被高举起来。中国传统戏剧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多彩, 同时也具有独特的审美特征。其中中外闻名的戏剧《牡丹亭》以其虚幻复合的艺术情境与丰厚奇特的多重意蕴, 并且塑造了封建统治下杜丽娘这一典型的女性形象, 历来引起人们极大的审美兴趣。

在中国戏曲文化蓬勃发展的时期——明朝, 《牡丹亭》成为了不可或缺的标志剧目, 其在中国戏曲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 从名剧《牡丹亭》入手, 剖析主人公杜丽娘的人物形象, 与其他类型的作品进行对比, 挖掘杜丽娘形象中蕴含的文化意蕴, 并了解作者寄托于其中的精神追求与深刻意义, 探究其对后世在文学、艺术、思想方面的深远影响。同时通过对《牡丹亭》这一作品内容的深入探究, 我们可以逐渐领略到中国古典文学和戏曲艺术的精髓, 从而领悟到中华民族文化内涵的精髓, 领略到美的无限魅力。

《牡丹亭》作为明代文学家、剧作家汤显祖演绎“至情”的代表作品, 在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均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历来有无数人士对它进行过评点与研究, 直至今日, 仍不绝如缕。江巨荣教授在他的《二十世纪〈牡丹亭〉研究概述》中对这些“成绩”(主要是上个世纪这一时段)进行了宏观地论述与评价。^[1]时至今日, 也仍然可在许多研究者的文章里见到反响。

还有的研究者对《牡丹亭》主题及“情”的理解是许多意见的综合和发展, 如孙书磊指出“《牡丹亭》的题材虽是婚姻故事, 但它的主题并非在于表现爱情。它所要表现与赞颂的却是人的欲望, 不仅包括对幸福生活的渴望, 也包括对大自然美丽风光的热爱、对生命美好的追求”。^[2]从其被创造出来至今, 关于《牡丹亭》主题意蕴以及人物形象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

学者奚晓天^[3]认为杜丽娘形象中有矛盾性的特点, 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接受传统教

育与反抗传统之间的矛盾，“至情”形象与“至理”形象共存的矛盾，刚强形象与柔弱形象并存的矛盾。从以上种种表现中可以看出，杜丽娘身上所散发出的气息，带有一股强烈的矛盾性，既无法完全摆脱传统礼教对她自身的深刻影响，又对爱情产生了一种全新的主观认知，并努力进行抗争，展现了一个敢于反抗、为爱赴死而生的动人女性形象。

同时，学者吴昌林、费诗婷^[4]另辟蹊径，从社会建构主义理论角度出发，对杜丽娘女性意识的建构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认为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不仅应该看到《牡丹亭》社会所构建的杜丽娘女性意识是丰富而有价值的，对于后世女性读者意识构建有着积极推动作用，并对《红楼梦》及其他文学作品创作有着深远影响，使得她们的女性意识得到继承和发扬，而且还应该看到杜丽娘在《牡丹亭》这一人物身上缺乏生产力以及经济基础的形塑，致使她们的女性读者表现出负面反抗等现象。

一、杜丽娘女性意识表现

明朝传奇《牡丹亭》(全称为《牡丹亭还魂记》又称《还魂梦》或《牡丹亭梦》)是剧作家汤显祖所写的传奇(剧本)，万历二十六年(1598)。它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强烈的时代精神成为我国古代戏剧史上一部杰出的作品。杜丽娘，一位身份显赫的官家千金，在梦中深深爱上了一位名叫柳梦梅的书生，但最终却因伤势过重而离世，化为灵魂，追寻着现实中的真爱，经历了人与鬼的爱情，最终重获新生，与柳梦梅结下了永不磨灭的爱情。

(一) 杜丽娘女性意识的个体性

从表面上看，杜丽娘似乎是一个对爱情、对人生充满着美好向往、追求自由、勇于追求的女性形象。实际上，作者所塑造的杜丽娘却是一个性格鲜明而复杂，令人难以把握，使读者读之而有莫衷一是的感觉。正是这种感觉使得我们不得不思考作者在塑造这个人物时所用的独到之处。《牡丹亭》中杜丽娘这一人物形象个体性较强，这主要是由于杜丽娘作为贵族之家之女，自幼接受了强烈的家族教育而将其形象直接塑造为一个时代标准——大家闺秀。

《寻梦》这一部分是杜丽娘形象独特性的充分体现，展现了她不同的一面，梦里的她追求自由，向往理想爱情，独特的个性与美妙的梦境交织，在作者的笔下，一个栩栩如生、极富个性的女性形象立体了起来。而残酷的事实仍然把她打回了原形，造成了强烈的反差，对杜丽娘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为之杜丽娘郁郁寡欢，病逝。但在阴间杜丽娘却寻找到了快乐，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更加反衬了杜丽娘个性化的一面。

作者笔下所塑造的杜丽娘，在她身上体现出来的个性特征，其影响力和作用，都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一部伟大的作品必然也反映了一定的时代社会特征，因此如果我们仔细品读《牡丹亭》就会发现：杜丽娘身上的这些个性特征，既有她自己的影子，又有作者创作时的一些特征和习惯，同时还有社会因素的影响。作者通过这些个性特征和社会因素的结合，对人物进行了创造性塑造。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个性特征和社会因素也都不是作者凭空想象出来的。在创作《牡丹亭》时，作者对人物进行了创造性塑造，并且受到了一定的社会因素影响。因此，杜丽娘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这些个性特征和社会因素就都有其一定的必然

性。

同时，汤显祖在创作《牡丹亭》的时候也用到了两个独特的意象——“花园”与“冥府”，这两个意象不仅是人物的生存和叙事空间，而且还具备一定的隐喻意味。“花园”代表着对身体躯壳的隐喻，而“冥府”则代表着被压抑的情理世界的隐喻。这两个意象分别以情和理作为整个作品框架建构的理论基础，构成一种对角式的对立关系。在这个空间通道中，杜丽娘从“花园”到“冥府”，从“冥府”到“花园”，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类似生命环节的转换仪式。通过这种形式，杜丽娘塑造了自己的独特性，完成了身份、命运的转换，而“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至情主旨，也经由这一仪式框架呈现出来。^[5]

1.对爱情的追求

《牡丹亭》中，杜丽娘是个情窦初开、如醉如痴的少女，她对爱情有美好的憧憬和追求，然而她却对婚姻毫无憧憬，这反映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对女性的禁锢与束缚。在《牡丹亭》中，杜丽娘和柳梦梅彼此倾心，二人都在心灵深处追求真爱，彼此之间建立了一种平等的情感纽带。杜丽娘在精神上得到了升华和洗礼；而柳梦梅在情感上也得到了满足和慰藉。他们在精神上是平等的；他们的爱情又是美的、高尚的；这也正是他们各自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美好品质。

从书中我们能看出，杜丽娘是一个大胆追求爱情、自由、个性解放的女性叛逆者形象，守礼中不乏反叛，温柔中更有刚强，该剧细腻刻画了她反叛性格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杜丽娘是一个温良贤淑的大家闺秀，苦于幽闺，乐于梦境。游园惊梦象征了杜丽娘青春意识的苏醒，她身处压抑自由人性的人生氛围中，长辈的人生价值观受到理学的深刻影响，在这样的环境中，杜丽娘的个性自然具有温良贤淑之处，但她没有泯灭的自然天性也在不断成长。杜丽娘因感春而进入梦境，梦里遇见柳梦梅，虚幻梦境打开她的少女情窦让她难以忘怀。这种生存环境使她成长为封建礼教下独特绚丽的一朵花，造就了她“生而有情，因情生梦”的性格特征，这种性格也在冥冥中使她执着地追求心中的爱情。

2.对传统的反抗

同时，人性和理性的情与理也在杜丽娘身上交织，揭示出当时的社会背景对人性自由的压迫和束缚，作者将对人性解放以及女性意识的追求寄托在杜丽娘身上，与她本身的特质融合在一起，十分的贴合和富有感染力。杜丽娘以“情”战胜了理，体现了“情之必所有，理之必所无”的主旨，刻画了一个敢于同封建势力做抗争的女性形象，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典型性的意义，为后人对女性形象的思考和描述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顺从性的女性形象，突出了杜丽娘对爱的强烈追逐，俨然一副具有自我意识的女性群像。

受王学思潮影响，汤显祖以其特有的戏剧表现方式塑造出杜丽娘这一形象，同时又夹以情理关系解释。杜丽娘虽出生于典型的封建士大夫之家，被赋予了浓厚的封建礼教色彩，却并非是反抗封建礼教而具有自然情欲与恪守夫妇人伦双重品格的儒家妇女，其至情至理观一直保持着儒家伦理观框架。汤显祖在主张人的自然欲望的同时，并没有抛弃先秦以来的儒家

传统伦理，因而《牡丹亭》召唤的是一个情与理并存的世界。^[6]杜丽娘诞生于名门闺秀之家，深受封建礼教的严格约束，这使得她必须具备三从四德的贤妻良母的品质，相夫教子，操持家务。作为宦宦小姐，杜丽娘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知书达理，乖巧懂事，可谓是那个时代集所有美好于一身的女子，但就在这样一个典型的传统女性身上，又不可隐瞒的体现了她对爱情、自由的强烈向往和渴求。而这种情感是人作为高级生物发展的正常规律，是不可避免的，而扼杀反而会造成不好的后果。作为一个天真善良的少女，杜丽娘这种朦胧的对外部世界的向往、对爱情的渴望才是她通往成长之路所必须经历的过程，才是符合人性的成长规律的。而这种向往也是她后面一系列故事发展的助推力，唤醒她的与其说是其内心深处被压抑的天性，不如说是通往后花园“桃花源”的一方天地。

在这种压抑的环境中，杜丽娘能从封建束缚的女性形象走向觉醒，不仅是后花园狭窄空间的助推，更是有她在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意识和情感的爆发，肯定和被接受是她融入到骨子里的自我意识。

（二）杜丽娘女性意识的社会性

“一般说来，人们都承认，人性包括自然性与社会性两大方面”。^[7]杜丽娘作为一个自然人存在的同时，必然有属于自己社会性的一面，且自然需求的满足，需要依靠社会性的支撑。所谓的社会性就是作者在创作过程中需要把握住当时社会的环境特点，才能把人物刻画得具有很强的自身特点，同时还要使得个性与共性形成矛盾统一的一面。^[8]只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作者往往把杜丽娘形象中的自然性放大、突出，正由于汤显祖将杜丽娘这一形象塑造得矛盾重重，所以她自身的人物角色也就极具可读性。若将《牡丹亭》主旨思想定位于此，则对于历来认为杜丽娘这一形象存在抵牾之处也将得到更加合理的解释。《牡丹亭》中杜丽娘重生之后牵挂的都是媒妁之言，怀念柳梦梅的科举功名，这一举动似乎违背了其地府阴间的情投意合，其实，这正是杜丽娘这一形象作为一个人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分析表明，这种描写也反映了个人虽然追求了自己的人格，但仍摆脱不了社会给个体所带来的桎梏。学者徐新敏^[9]认为如果说“生者能亡”，从生到死这一过程展示了人生的自然性方面的话，那么这种“死亡能够诞生”的过程就是展示了人的社会性或精神生活方面。死而复生的杜丽娘，是个有着清醒思想和坚韧毅力的女性形象，在捍卫原有真情的前提下，杜丽娘力图维护自己上流社会中大家闺秀的美好形象，基本依照当时的人生、社会价值来生存。她自画像上有“他年得傍蟾宫客，不在梅边在柳边”的题词，“蟾宫客”历来就是杜丽娘倚重与选择伴侣的对象，其实杜丽娘夫妇俩是实实在在地追求功名的一对。对于杜丽娘这种社会性的探究，我们不难发现，她身上所承受的社会规范和限制是相当强烈的，即使她拥有独特的个性和特质，也难以摆脱封建世俗的束缚，这是当时社会大环境的必然结果，仍然逃脱不掉根植在深处的社会观念。

杜丽娘不仅需要社会大众的认可，更想要实现自我价值。这种社会性和个体性在她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她对婚姻提出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鬼可虚情，人须实礼。”的要求，这句话出自杜丽娘之口，这正是汤显祖对于“健全人”的清醒认识，鬼可以只谈感情，

只有人的自然性的一面；“虚情”在这里可理解为仅需感情，但人类要有情且有礼。人要有“实礼”，这“实礼”，就是社会中存在的秩序、规矩、伦理纲常及价值观念等。^[10]重生后的杜丽娘在《走婚》中向柳梦梅表明自己已为女儿之身，并主动宣称“柳郎，奴家依然是女身”，然而当柳梦梅提到“已经数度幽期”时，杜丽娘却反驳道：“那是灵魂，这才是真正的正身陪奉。伴情哥则是游魂，而女儿身则仍然含胎”。她不仅看重自身在社会中的形象，而且还有夫君在社会中的地位，因为“夫贵妻荣”这一封建社会的真理是不可动摇的。杜丽娘作为一个社会中的人自然也看重这种名誉，且从小的熏陶的教育也让她的这种社会性始终如一，不管是虚拟梦境还是残酷现实，所以，从表面来看，杜丽娘的现实社会和非现实表现之间存在着冲突，其实并不矛盾，它是一个生命体的两种不同的需要。正是这种冲突，才使杜丽娘的形象焕发出独特的光彩，自然性与社会性的交织让她在无数人的阅读中展现魅力，成为一个活生生的、立体的人。

（三）杜丽娘与其他传统戏剧女性形象的对比

在中国传统戏剧里，还有其他的经典作品，如王实甫的《西厢记》和孔尚任的《桃花扇》，他们分别刻画了崔莺莺和李香君这两个女性角色，和《牡丹亭》里的杜丽娘相比较，这三个女人对爱情的追求是不同的，但是她们都受封建礼制所制约，金丝雀、笼中鸟，她们的追求与向往都被狠狠的打压下来，被禁锢在封建礼制这个笼子里无法获得自由。但她们却又一致、坚定地追求心中的挚爱，哪怕有重重阻碍，也奋不顾身。

1. 杜丽娘与崔莺莺的对比

其中，杜丽娘与崔莺莺在社会背景与家庭背景上有很大的不同。《西厢记》出自唐传奇《莺莺传》。故事原发生于唐代，然而由于元代戏曲家王实甫二次创作，《西厢记》部分地反映了元代部分生活风貌。元代时兴宗教，程朱理学社会观念渐为时人消解，加之其时元代统治者民族压迫政策，促使元代社会中的汉人对封建礼教在内心深处下意识的维护与推崇，因此在崔莺莺生活的社会时代中仍然被封建礼教所束缚。而《牡丹亭》创作的时代是明代，在当时的社会，程朱理学已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王阳明心学独领风骚，汤显祖所创造的杜丽娘形象则是王阳明心学思想在艺术作品上的生动表现和当时社会思潮的折射。他对女性自我意识的唤醒和对封建社会的禁锢，在《牡丹亭》里均有深刻表现。与崔莺莺所处的时代相比，杜丽娘所处的那个时代人们仿佛更加冷漠与麻木，封建礼教的束缚让人透不过气，二人均出身名门，四面高墙将其与现实隔离。她们一个出身太守府，一个出身相国府，都是大家闺秀，日常生活受到严格的管理。在她们生活的时代，男权主义极为严重，婚姻由父母做主，同处于官宦之家，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崔莺莺遇到心上人张生后，情窦初开，却因婚约在身，不敢追逐，犹豫不决。而在这一点上，杜丽娘却表现的极为勇敢，她对柳梦梅“毫无保留”，勇敢追求，甚至可以“教她生死相许”，实际上她也没有见过柳梦梅，只是因为一夕春梦而念念不忘。尽管显得多么荒唐和不可思议，但杜丽娘那种对爱情追逐的勇气和坚定却冲破生死边界，让人敬畏，体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

两个女主人公的结局也有着很大不同。在与张生西厢结合后，崔莺莺将生米煮成熟饭，最终迫使老母亲妥协，但老妇人也提出了一个条件，那就是张生必须通过科举考试获得状元的殊荣。而最后的结局也比较圆满，张生不负众望，考取功名，也抱得美人归，夫妻二人和和美美，过上幸福的生活。而杜丽娘与柳梦梅则比较艰辛。在柳梦梅考中状元之后，已经符合当时封建社会的要求，按情理来说，没有不让他们在一起的理由了，可是杜宝却不愿意承认这门婚事，他的封建顽固的思想阻碍了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结合。最终，经过杜丽娘在金銮殿上感人肺腑的诚挚发言，皇上深深感动，终于承认并御赐了她们的婚事。虽然两个女主人公都经历了波折，但还好，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也还是得到了圆满的结局。

《西厢记》用“情”打开了戏曲探讨人性的大门，而汤显祖的《牡丹亭》则将人性带上了舞台，将“情”视为人性的本能，在塑造故事情节的同时加入自己的哲学思考，这两位女性形象在文学史上都是极为珍贵的。^[1]同时，汤显祖的《牡丹亭》对王实甫的《西厢记》有着批判性超越。学者石评月^[2]认为首先汤显祖用洛神宓妃为神话原型塑造杜丽娘，旨在强调用“情”来抵抗“理”，是心而不是外，是思而不是肉，它超越了仿高唐神女崔莺莺“自荐枕席”之身体动作。其次，从崔莺莺的“会真”到杜丽娘的“写真”，反映了神女形象从“神性”到“人性”的变化，以及近世文学中对人的自我的强烈关注。汤显祖通过“自描春容”的行为来表现出对自我的认知，塑造杜丽娘社会性的一面，也体现了他对人的行为和情感的细腻观察与描绘，其描神写意和塑造人物的方式也超过了王实甫的《西厢记》。

2. 杜丽娘与李香君的对比

孔尚任的《桃花扇》生动地折射出南明王朝的兴衰史。明末清初，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后，民族矛盾愈加尖锐，知识分子苦不堪言，纷纷开始追寻着明王朝覆灭的缘由。在那个时代，传奇戏曲成为了文人创作的主流，而在众多传奇作品中，唯有《长生殿》和《桃花扇》两部作品独树一帜，其中李香君这个人物更是站在比崔莺莺和杜丽娘更高的角度上用才子佳人的故事来反映女性意识的深刻发展。她是妓馆为满足士大夫的需求而专心培养的才艺绝佳的艺妓，她虽出身社会底层，却坚强忠贞，不慕荣华，守身如玉，不畏权贵，她用自己的才艺赢得了侯方域的爱，但他们的恋爱过程一合一离，最后以分头“修真学道”的悲剧结尾。她以“可知定情诗的红丝拴得紧，抵得过自己的万两雪花银”在〔却奁〕和〔拒媒〕中明志，以“吾志在守节而不在于衣食。忍饥受寒绝不下此翠楼”，于〔守楼〕中守志，于〔骂筵〕中更大义凛然怒斥权贵马士英与阮大铖曰：“堂堂列公半边南朝见君峥嵘。出生于希贵宠、创业选择声容、后庭花多了几朵。”

在各种抗争的过程中，她始终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维护着女性人格的独立性，展现出崇高的品格。李香君的女性意识在这个纠缠的过程中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是对女性自由的一种抗争。杜丽娘经历了生死考验，而李香君则展现了她坚定的品格，这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独立而坚定的女性形象，栩栩如生。《牡丹亭》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塑造具有鲜明的特色，它以独特的方式展示出女性主体意识和自我价值追求，并由此体现出男性中心文化对女性主体性的

压制。如果说《牡丹亭》是一部以悲剧为主题的作品，那么它的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一部喜剧，而《桃花扇》则是一部彻底的悲剧了。读者们始终向往着完美圆满的大结局，向往着幸福、团圆，因此就有了《牡丹亭》这样充满矛盾，并让人感到疑惑的作品，也即无论在什么时代背景下，我们都期待着圆满，都希望现实与故事的结局往好的方向发展，如此才有了杜丽娘的死而复生与柳梦梅的美好结合。相比之下，李香君的结局则是悲剧的，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爱情悲剧不是个人的原因，而是整个社会背景之下的大悲剧，也正是孔尚任在《桃花扇·题辞》中所谓的“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二人的最终结局是道德选择的影响，也暗示着个人的命运与社会、时代密不可分。但无论结局怎样，这些作品以及主人公都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叙述着故事，展现着划时代女性意识的不同程度的觉醒。

二、杜丽娘的反抗精神

在《牡丹亭》中，杜丽娘这一女性形象的描绘，生动地展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呈现出一种深邃的女性气质。这种女性气质的形成与作者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是分不开的。在《牡丹亭》中，女性角色的形象刻画呈现出独特的个性特征，它以独特的方式展示出女性主体意识和自我价值追求，并由此体现出男性中心文化对女性主体性的压制。杜丽娘正处于青春年华的阶段，然而在这样一个风华正茂的年纪，她却被强制禁止手持秋千索，脚踩花园路，这是一项严厉的规定。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也能推断出杜丽娘这一形象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当时社会封建礼教束缚下的女性意识的萌芽，整个过程都是流畅、自然的。汤显祖的《牡丹亭》以多样化的视角和方式呈现于大众视野中，其中以戏曲为表现形式，不仅展现了出动听优美的戏腔，更将封建统治下被束缚的女性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对女性的压迫，同时也唤醒了女性意识的觉醒。

（一）《牡丹亭》中女性意识体现的缘由

明代著名剧作家汤显祖被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汤显祖在其作品中更多地站在人性高度上对女性生存问题进行探索，同时也站在女性角度上对人性自由与解放进行了追寻。而《牡丹亭》中的“至情”则是他作品中女性意识的极大体现。

女性意识就是女性作为主体实现了对于自身价值、社会地位以及人生自身的意识感知，而不再被男性中心主义眼光所禁锢和偏见所禁锢，从女性视角出发，感受女性心理状态及情感变化并观照社会上对于女性各种不公，把女性还原成一个同男性地位平等并拥有独立人格的人。结合社会建构论主张，实在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意识是社会文化与语言建构的结果。^[13]这意味着女性意识是在社会文化的影响下建构的。

从历史传承上来看，春秋时期的《诗经》中所描写的女性独立自主意识较强，敢于追求自由人格与理想爱情。而到了汉代时，由于儒家纲常伦理的确定，女子虽然也对爱情有强烈的向往，但渐渐的有了理性的成分。至唐代，唐传奇使离魂还魂这一独特主题成为男女情爱抒发的一种方式，陈玄的《离魂记》便是其典型代表之一。到了元代，元曲、杂剧等题材产生，王实甫的《西厢记》塑造的崔莺莺形象是富有独立自主的女性意识的一大体现，如果说

崔莺莺这一形象体现出来的女性意识尚处于萌芽的状态，那么《牡丹亭》中塑造的杜丽娘则提出了女性对个性解放与爱情自由的更高层次的新要求。时代的发展与前人的遗留，汤显祖在历史传承下，沉淀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形象韵味，塑造出杜丽娘这流传千古的经典女性形象。

从汤显祖自身的经历来看，汤显祖曾拜泰州学派的中间人物罗汝芳为师，学习其真传和教诲，思想境界有了很大的提升，塑造了汤显祖注重情的意识。汤显祖在中年时代又与达观禅师相识，深受达观宗教哲学影响，并受达观进取精神感召而提出与“理”相对立的“情”。如此复杂和坎坷的学习、生活经历塑造了汤显祖独特的文化意识和精神，形成了他独特的思想风貌。同时他在官场失意，自身屡遭不幸，更能体会到女性作为社会底层人物的那种艰苦，并对她们赋予同情和怜悯，在自己的作品也深刻的体现了出来。

杜丽娘在学习了《诗经》之后，对自身在客观的现实世界里的自我意识得到了改变，杜丽娘女性意识的醒悟体现出女性主体意识是在社会文化氛围的影响下进行的。杜丽娘饱读诗书，丰富的阅历让她有着过人的谋略和胆识，在花园里她吐露心声，仿佛找到了自我的映像，照见自己的人生，觉察到自己所处的被男性主宰的压抑环境，十六岁的青春年华，就如同这姹紫嫣红的花园，那么热烈蓬勃，却独自，开放，没有知音，没有欣赏者……一种生命在宇宙中独自开放又独自凋谢的巨大孤独感，包围了她。那是生命的第一次觉醒。她逐渐意识到她的大好青春与美貌被父母束缚在深院之中，她的生命和爱情被父母主宰，逐渐地她意识到了正值青春之时不能遇到佳遇，也意识到她的青春和价值如同绿叶一般，寂静无声，生与死都不知外面的大千世界如何。随后，杜丽娘在梦中与柳梦梅相聊甚欢，一拍即合，但她梦醒后却怎么也找不到柳梦梅，寻寻觅觅不得，日渐消瘦，她的父母却不顾她的意见，强硬的要将她许配给别人，最终杜丽娘遗憾病逝。表面上杜丽娘是慕春而死，实际上她是因柳梦梅，慕色而死。^[14]《牡丹亭》出版后，引起了当时社会尤其是女性群体的强烈回响和共鸣。通过作品所展现出来的女性意识深深地触动了当时被封建礼教压迫的无权无势的女性们，她们向往爱情、渴望自由。作为一名男性作家，汤显祖却能站在女性的视角下去探寻女性意识的觉醒，去关注女性生存和地位的合理性，他为女性发声，这无疑具有超越时代跨度的历史意义。

（二）《牡丹亭》中杜丽娘的女性意识体现

《牡丹亭》中杜丽娘这一女性形象造就了其与众不同的女性意识，女性的情感欲望来自自然属性。杜丽娘深处封闭空间，无法接触到万千世界，后花园助推了一把，促使她的女性意识觉醒，她终于可以借此机会去体会人生的美好，自由被释放，欲望得到了满足。在她的自我与社会性冲突时，她谨记《关雎》，同时也启发了自己的思考，心之向往纵然不合乎情，不合乎于理，但就是此契机也使她的女性自我意识第一次懵懂，并开启了反抗与起义之路。

[15]

杜丽娘游花园之后，外界的艳阳高照促进了杜丽娘的苏醒，惊醒了杜丽娘对自我的热烈

感情，焕发出青春的活力，让杜丽娘希望摆脱禁锢于自身的隐形枷锁而义无反顾地踏上反对封建礼教的征途。黑格尔说：“对于优美高尚的女性，只有在爱情中揭示周围世界和她自己的内心世界，她才算从精神上脱胎出来。”^[16]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杜丽娘将自身作为封建时代女性的核心地位从边缘拉回，从被动转变为主动，掌握着在这个男权主导的社会中的生存空间，并将其扩展至更广阔的领域。在现实生活中，杜丽娘那种情感渴求得不到满足，苦闷抑郁无法排遣，找不到出路，双重压力下，她只有将这种情感寄托在梦境中，高人点化之下，幽会梦中情人柳梦梅，那刻骨的欣喜之情让压抑于杜丽娘心中的抵抗之情油然而生，与柳梦梅坠入爱河。借助后花园这把利剑，杜丽娘充分的去体验生命的乐趣和伟大的爱情，去拥抱自然所赋予的情感。

后花园的园中景致也暗示了杜丽娘的女性意识体现。花园面对她，也变成了一面镜子，如她像花园的景致一般无人观赏，甚是可惜。^[17]在这里又体现了杜丽娘女性形象的一面，但她的思想与之前已大有不同，她不再从弱小、依附外界的角度出发，而是变成了敢于表达，敢于展现女性自我意识的女子。人的思想意识一旦改变、觉醒，便不会消逝，杜丽娘就是这样的。现实与梦境的巨大落差，使她抑郁而病，她无法很好地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最终病逝于寻梦觅爱的路途中，但这并不是对现实的妥协和逃避，而是以杜丽娘自我的方式与当时的社会进行的反抗，她看似消逝，实则以另外的方式重生，是对过去的告别。从女性主义视角看《牡丹亭》中的女性形象，读者可以体会到女主人公的女性意识的醒悟，婚姻爱情观的改变，语言文采含蓄内敛，同时又兼具内柔外刚、以柔克刚的硬气，这些也与王学思潮、儒家伦理以及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社会文学的复杂性与现实主义传统的影响有关，也渗透了汤显祖本人天人合一的人性理论思想及其在世生存论的观点。他人对杜丽娘的“自我”形象进行了塑造，导致她的主体内在性呈现出一种“外在性”，即一些外在的事物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主体内在的一部分，类似于影子。这也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的存在悲剧感。但杜丽娘还是义无反顾的表达自己的主体性，用生命去追寻。按照学者夏志清的说法^[18]这是一种超越时间、生命、死亡的热爱。这不得让我们联想到康德的第三批判，当人获得那种主观的、非实体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感觉时，就会感到人是自由的，审美是这样的，爱情是那樣的。虽然在短暂的体验了生命与爱情的快感后，主体本身还是要受到各种无形的束缚，但当时转瞬即逝的绝妙感觉足以让人满足，让人感受到自身的掌控性。

杜丽娘用生命的终结进行反抗，与封建社会坚决斗争，救赎了自我，同时也获得了又一次新生。与其作茧自缚的活着，不如选择轰轰烈烈的去选择自己向往的生活方式。情之至者，刚柔并济。“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皆非情之所至也。”^[19]“情”在烈火里得以重生，如同凤凰涅槃，它的力量非“理”可比；人之常情的“理”不可混。礼教不能再束缚住她对真情的肆意宣泄。她的性格在获得新生后发生了巨大改变，这样的改变不仅是反抗精神所起的作用，而且是一整个社会所迈向前的一步。

三、杜丽娘形象的当代价值

杜丽娘这一形象体现了女性意识的苏醒，对当时社会男女地位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体现了个性解放，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女性勇敢的追求情感自由。杜丽娘的爱情，已经超越了人们对普通爱情的理解，她在“爱情”这个词中，不仅公开提倡“重生”，而且把其提升到“人”的层次，而且还毫不留情地批评、嘲笑了当时的封建伦理道德，其影响范围之广，可见一斑，不一而足。杜丽娘女性意识的觉醒应是我们学习的对象，追求女性主体，追求个体生命本真状态。重视情欲的理想追求，同时也渴望有情的幸福生活。

时至今日，虽然时代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历代对《牡丹亭》进行模仿的作品层出不穷，戏剧舞台上不缺乏描绘人性和爱情的作品，创作者和观众将目光聚焦在人性层面，使作品有了一种由内而外的生命力。作为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中最具代表性的代表作之一——《牡丹亭》，其在中国享有广泛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该剧不仅以其精湛的艺术魅力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与赞誉，更成为了我国戏曲史上一部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这部自明代传承至今的戏剧作品，由于不同的师承传承，每一个院团都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尤其是在当代，随着社会发展和艺术进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昆曲，昆曲也因此得到了空前的重视。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所独有的南昆传承版《牡丹亭》在上海保利上演，是根据舞台演出传统版而创作的，传承自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昆曲皇后张继青，经过数十年的精心加工和提升而成。该剧将原着戏曲元素与现代艺术相结合，使其更贴近当代大众审美情趣和欣赏习惯。南昆版《牡丹亭》以五折经典剧目勾勒出一部“小全本”，以“月落重生灯再红”的开放式结局，唤起了观众无限的遐想。表演风格细腻典雅，舞台呈现具有鲜明的南昆特色与吴文化底蕴。同时，另一个不同版本的《牡丹亭》青春版，自2004年首演至今，获得了诸多好评，受到各地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喜爱，甚至有学生观众看后感慨：宁愿醉“死”在《牡丹亭》中，永远不要醒过来。也被很多人誉为“此生不可错过的昆曲演出”！基于汤显祖的原著，青春版《牡丹亭》经过精心梳理，以“梦中情”、“人鬼情”和“人间情”为核心，共分为八个篇章，将杜丽娘和柳梦梅最经典的戏份展现给观众。这个版本的《牡丹亭》既新颖又合理的舞台形式，使汤显祖这部伟大作品所蕴含的人性、文化、生命境界得到高度发挥。

在小说中，杜丽娘的形象被刻画得淋漓尽致，彰显了她的至情，肯定了自然人性，并将情与欲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对于传统道德观念的倡导贞节纲常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同时也体现了时代精神的鲜明特征。杜丽娘这一形象折射出明代晚期张扬个性、申明真情的社会思潮对程朱理学束缚下的人性实质进行了强烈的撞击与批判。因此杜丽娘的形象对当今社会仍然具有极大的影响，与女子三从四德等的封建理念坚决斗争，冲破任何附加在性别身上的枷锁，呼吁对自然人的尊重和平等，由此可见，杜丽娘作为女性觉醒的先行者对当代女性正确追求爱情、个性解放的自由和自我意识具有重要意义。但凡伟大的经典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读者均提供同样的观点和客体，也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

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1]恰恰相反，它总是显现出无限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开放性。它的本质只有在历代接受者的永无完成的效应史中得以展现。因此《牡丹亭》也在时代的长河中经历无数的冲洗，接受多元的解读和体会，摒弃单一的、绝对化的理解，才能带给我们更加深刻和独特的启示。

在《牡丹亭》之后，又出现了许多以女性形象为主的艺术作品，她们都各有不同，同时又差异中极具相似。虽然都被封建礼教束缚，但也都对爱情和幸福具有极大的向往，执着与坚定不逊色于杜丽娘。视角转向到现代来，现代社会所塑造的女性形象虽然与古代有极大的不同，但体现了时代特色，从更新奇的角度阐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值得思考和学习。

参考文献

- [1]联邦德国 H.R 姚斯,[美]R.C 霍拉勃著,周宁,金元浦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 [2]叶澜.教育概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 [3] (明)汤显祖:《牡丹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
- [4]孙书磊.人欲的赞歌——对《牡丹亭》主题的再认识[J].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1996,(01).
- [5]江巨荣.二十世纪《牡丹亭》研究概述[J].上海戏剧,1999,(10).
- [6]杜改俊.叙述生命的需要——《牡丹亭》中杜丽娘意义再探讨[J].艺术百家,2004(04).
- [7]徐新敏.试论《牡丹亭》杜丽娘形象的多重意蕴[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7(11).
- [8]缪丹.试论《牡丹亭》杜丽娘形象的多重意蕴[J].戏剧之家,2016(18).
- [9]罗嘉敏.论《牡丹亭》中杜丽娘至情形象的伦理品格[J].大众文艺,2020(16).
- [10]盛颖涵.中西戏剧中的女性意识比较——以《牡丹亭》与《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3).
- [11]李瞻良.中国传统戏剧中的女性意识书写——以《西厢记》《牡丹亭》《再生·缘》为例[J].戏剧之家,2020,(14).
- [12]韩凌宇.《牡丹亭》《西厢记》中的女性角色之比较研究[J].新纪实,2021(20).
- [13]张焯.中国传统戏剧中女性意识的觉醒——对《牡丹亭》中杜丽娘形象的再认识[J].今古文创,2021(35).
- [14]奚晓天.“一生爱好是天然”——《牡丹亭》杜丽娘的人物审美分析[J].参花(中),2022(09).
- [15]吴昌林,费诗婷.《牡丹亭》中杜丽娘的女性意识建构分析[J].山西能源学院学报,2022: 4,12.
- [16]陶明玉.论《牡丹亭》的空间隐喻与通过仪式[J].四川戏剧,2022(10).
- [17]邓斌.浅析杜丽娘人物形象观照拉康镜像理论[J].艺术教育,2022(10).
- [18]姚满团.一种阐释意识问题的新取向[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7.
- [19]石评月.论汤显祖《牡丹亭》对王实甫《西厢记》的批判性超越[D].华东师范大学,2022.

A Study on the Female Consciousness of Du Liniang in "The Peony Pavilion"

Liang Panli

(School of Literature,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City, Henan Province, 450000)

Abstract: "The Peony Pavilion" i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works of the Ming Dynasty playwright Tang Xianzu. It extols the "ultimate love" that "one can live for love and die for love", which is most prominently embodied in the character of Du Liniang in the play. The book takes the female character Du Liniang as the main focus, narrating her extraordinary and unique love story, and showcasing her bravery and determination in pursuing love. This paper takes the character of Du Liniang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ity in her female consciousness, and then compares her with other traditional female characters in dramas to deeply explain the formation reasons and manifestations of Du Liniang's female consciousness. It further analyzes the cultural implications contained in her image and the female self-awareness, elaborating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to grasp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the character image and describe its value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to appreciate the rich emotions and artistic value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book.

Keywords: "The Peony Pavilion"; Du Liniang; Character Image; Cultural Implications; Female Consciousness